叙事学视域下的外宣翻译研究

刘伟 杨淑芳 牛艳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叙事学视域下的外宣翻译研究

刘　伟　杨淑芳　牛　艳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叙事学视域下的外宣翻译研究 / 刘伟，杨淑芳，牛艳著. --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22.2

ISBN 978-7-206-18892-3

Ⅰ. ①叙… Ⅱ. ①刘… ②杨… ③牛… Ⅲ. ①中国对外政策—宣传工作—语言翻译—研究 Ⅳ. ① 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2) 第 024551 号

叙事学视域下的外宣翻译研究

XUSHI XUE SHIYU XIA DE WAI XUAN FANYU YANJIU

著　　者：刘　伟　杨淑芳　牛　艳

责任编辑：孙　一　　封面设计：杨婷婷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130022）

咨询电话：0431-85378007

印　　刷：长春市昌信电脑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9.5　　字　　数：180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18892-3

版　　次：2022年2月第1版　　印　　次：2022年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5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前　言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政府有着强烈“走出去”的内在愿望，国际社会也有了解中国的热切需求，外宣翻译是一条沟通两者至关重要的途径，因此展开外宣翻译研究尤为必要。目前外宣翻译研究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还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作为学科发展的基础，外宣翻译缺少统一、完整的理论话语体系，系统架构还需完善，一些基本概念也需澄清、厘定；第二，在研究手段上，外宣翻译目前大多是采用定性分析的实证研究，很少利用较为先进的语料库进行定量分析，研究手段比较单一；第三，在理论研究上，外宣翻译中大多数研究仍旧停留在随感式的经验总结上，已有的理论研究也多是套用“译入翻译”理论，缺少兼顾宏观和微观、理论与实践，符合外宣翻译特点的系统性、深层次、跨学科的“译出翻译”理论成果。

针对上述问题，本书认为外宣翻译研究要进一步发展，须从基础研究、实践研究和理论研究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本书着力于第三个方面，尝试在理论研究方面进行探索。叙事学的发展历经经典、后经典，从单一走向多元，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静态走向动态，拥有了兼具微观与宏观、理论与实践的学术阐释功能。外宣翻译是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把大量有关中国的各种信息和观点从中文翻译成外文，通过各种媒介和渠道向国外受众传达的跨国界、跨语言、跨文化的对外传播活动，目的是通过以我为主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传播，让世界了解中国，建构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增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本书尝试求证将叙事学用于阐释外宣翻译的可行性。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 001
一、研究背景 …… 001
二、理论框架 …… 003
三、研究问题 …… 006
四、研究意义 …… 007
五、研究方法 …… 008
第二章 基本概念阐述 …… 009
一、宣传 …… 009
二、对外宣传 …… 010
三、外宣翻译 …… 011
四、外宣翻译的英译 …… 014
五、本章小结 …… 018
第三章 外宣翻译研究现状 …… 019
一、国内研究现状 …… 019
二、国外研究现状 …… 030
三、现有研究不足 …… 033
四、研究可能进路 …… 036
第四章 叙事学与外宣翻译的关联 …… 038
一、叙事学的演进路径 …… 038
二、叙事学与翻译 …… 040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三、叙事学与外宣翻译 …… 042
第五章 外宣翻译的叙事选材 …… 043
一、叙事框架 …… 043
二、叙事赞助人 …… 055
三、叙事接受者 …… 062
四、对外传播规律 …… 064
第六章 外宣翻译的叙事建构 …… 066
一、再叙事涵义 …… 069
二、微观的文本层面：叙事交流 …… 076
三、宏观的意识形态：叙事竞争 …… 083
四、本章小结 …… 090
第七章 外宣翻译的传播实践 …… 091
一、译本与翻译传播实践之关联 …… 091
二、翻译传播实践与翻译社会实践之关联 …… 114
三、译本与翻译社会实践之关联 …… 115
第八章 外宣翻译叙事接受 …… 127
一、采用“二元共存”的翻译策略 …… 131
二、采用编译的翻译方法 …… 140
三、本章小结 …… 142
第九章 结 语 …… 144
一、内容总结 …… 144
二、局限与不足 …… 144
三、前景与展望 …… 144
参考文献 …… 145

第一章 绪 论

一、研究背景

在我国全面发展的进程中，中华文化的璀璨格局不单单是独属于自身的，也是世界文化艺术瑰宝中的一部分。正是因为如此，中国应该为了全球文化格局的发展、构建、升级，奉献力量，打下扎实的基础，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切实丰富世界文化的发展内涵与历史渊源。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综合实力、社会进程、经济建设、城市化程度都不断提升，国际地位也稳步增长，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密切交流与相互合作也稳步增强，呼吁中国文化广泛传播、全面推广的声音越来越强烈，在此方面，我国也不断努力，致力于文化发展与文化创新，逐步将中华文化传播到全世界范围内。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我国开始设立各式各样的文化刊物，并推出英文版本，翻译各式各样的中华文化书籍，出版大量的英文版本的文化书籍，推动我国图书的对外发展、对外传播、对外推广，以此全面推动我国文化的创新发展，实现我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互动交流，促进我国文化走出去，传播开来。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对于我国文化而言，从以往的“引进来”发展局面到现在的“走出去”发展局面，恰恰展现出了我国社会领域内大量群众想要将优秀的中华文化，宝贵的中国文化精髓传播到全世界，传递给全人类的迫切愿望与真诚态度。

与此同时，国际领域内也期待深入感知、全面了解、正确解读中华文化的内在精髓与宝贵之处，对我国文化的全面推广与不断普及具有一定的渴求心理。在多年的发展中，我国社会领域不断腾飞，经济建设不断发展，向世界展现了一个优秀的大国风采与大国魅力，创新发展的背后都蕴藏着强大、珍贵、优秀的中国文化，它引领我国的发展，促进着我国的进步，推动着我国的创新，而国际领域内的人们也渴望探寻中国文化的魅力，了解中国文化的内在生命力，这也推动了我国文化的推广之路，促进我国文化走出去。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综合经济实力持续增长，生产总值一直处于稳步增加的发展状态中，所创造的经济成就与经济能量是巨大的，在对外合作、对外交流、对外发

展中也成绩突出，影响力与号召力都持续增加，这也引发了国际领域的高度重视与重点关注。为此，国际社会领域内的人们一方面希望探寻我国文化的深邃性、发展性与内在性，另一方面希望迫切了解我国文化的政治制度、科技水平与经济策略等。

在“走出去”的战略部署下，面对国际领域人们对于我国文化迫切的了解需求与探索欲望，不断推进对外宣传工作既是有效的发展渠道，也是有力的实践支撑。为了更加全面、积极、广泛、透彻地展现我国文化，将我国宝贵的文化成果贡献给全世界，我国已经构建了相应的对外宣传发展体系，构建了对外宣传发展格局，依托图书领域、报刊领域、电视领域、计算机网络系统、会议会务领域等，搭建起多层次、多方面、多维度、全方位、综合化、系统化的对外宣传体系，这为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打造了合理发展的契机，提供了强劲有力的保障。

在对外宣传工作机制中，目标受众群体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外国人，而外国的宣传组织机构以及外国的宣传媒体在宣扬、推广、传播我国的文化时，往往需要借助于外语的形式，对我国的文化内容进行信息解读、信息剖析、信息采写、信息传播。虽然部分大型新闻媒体在宣传、推广的过程中也开始尝试搭建“采写、编制、翻译”三位一体的对外宣传方式，但从整体上来看，最开始就借助于外语进行创作、输出、传播等活动并不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也不能够保障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稳步实施，为此，我国在对外宣传方式上仍旧采取了先输出中文、再翻译为外国语言的方式，以此满足我国对外宣传的迫切需求，为我国文化的全面推广与快速传播打下扎实的基础。正是因为如此，我国的翻译领域内逐步诞生了一种新型的翻译模式——外宣翻译。

在我国的对外宣传实践活动中，外宣翻译具有重要的影响与关键的作用，它在我国系统化、全面化、积极化的对外宣传实践活动中占据了关键的地位，是切实有效的发展路径与传播渠道，可以不夸张地说，我国文化能否在最短的时间内走出去，是否可以获得快速发展的契机，是否可以不断腾飞、全面推广，与外宣翻译的效果具有直接的联系。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外宣翻译实践活动的关键性、创新性、价值性是显著的、明确的，但是，在实践发展维度上，外宣翻译实践活动还面临一定的阻碍与制约问题。虽然不管是在政治发展领域，还是在新闻探索领域，抑或是文化传播领域、科技进步领域、法律保障领域、旅游推广领域等，外宣翻译实践活动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获得了较多的赞誉，但是，从整体情况上来说，外宣翻译的实践发展层次还需要增强，外宣翻译的实践发展成绩还需要提高，外宣翻译的实践发展局面还需要改善，这

也是我国的外宣翻译实践工作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从我国的外宣翻译实践工作的发展桎梏来看，西方国家仍然占据着大量的、显著的、突出的传播优势，与此同时，我国的外宣翻译实践工作也需要更进一步的发展与增强，以此契合我国对外宣传的工作要求与现实需要。在实践发展维度上，我国的外宣翻译实践工作的传播效率、传播质量、传播速度都需要稳步增强。在理论发展维度上，虽然大量的研究人员、专家学者都依据各式各样的语言理论、传播知识、文化基础、翻译知识等，针对外宣翻译实践活动开展了系统化、全面化、深入化、透彻化的解读，但是，外宣翻译实践研究的视角仍然需要更进一步的开拓与延伸，综合化、科学化、深入化、层次化的理论研究还需要更加深入的拓展。

在实践探索层面上，叙事学的相关理论知识与发展成果为我国的文化经典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可以推动我国的外宣翻译实践工作从单一化、简单化走向丰富化、多样化、多元化，可以促进我国的外宣翻译实践工作从封闭化、传统化，走向开拓化、开放化，能够促进外宣翻译实践活动从以往的静态化、桎梏化，逐步迈向创新化、动态化，实现微观发展领域、宏观发展领域、理论探索层面、实践推广层面上的研究高度与学术阐释效果。叙事学的价值与作用是巨大的，对于我国的外宣翻译实践活动意义重大，能够被有效地运用于文化探索、文学鉴赏、文化批评方面，也能够被融入外宣翻译发展活动中，推动我国的外宣翻译探索活动的实践发展与全面进步。在外宣翻译的实践发展活动中，我们能够借助于叙事学的相关理论知识与探索内容，以微观发展角度为切入点，立足于文本发展层面，从宏观发展角度入手，依托意识形态发展领域，全面揭示我国的外宣翻译实践活动的内涵本质与发展根基，在实践探索维度上优化外宣翻译实践活动的推广质量、传播水平、宣传力度，在理论发展维度上开拓外宣翻译实践活动的研究视角、研究深度、研究思路。基于上述分析，在我国的外宣翻译实践活动与探索研究中，叙事学是重要的发展理论与实践根基。

二、理论框架

从历史角度来看，叙事学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960年左右，在六十多年的探索实践中，叙事学的研究维度可以被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是“经典阶段”，第二个是“后经典阶段”。对于前者而言，研究人员习惯性地称呼此时的叙事学为“经典叙事学”，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国结构主义的影响，在它的全面发展历程中，主要以文本作为重要的发展核心，希望从丰富化、多样化、多元化的作品中探寻到叙事的常规化、一般化、集中化的发展规律，

以此为基础，逐步构建起相应的叙事语法或者叙事诗学。对于后者而言，研究人员习惯性地称呼此时的叙事学为“后经典叙事学”，它的英文名称为“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由于受到当时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学术领域的相关影响与作用，研究人员非常重视将叙事学的相关作品融入社会发展的历史维度以及文化情境中，非常关注跨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与实践探索，非常重视创作者、文本内容、受众群体、社会历史维度、文化语境等方面的相互交流、相互作用、相互发展问题。

在经典叙事学的发展维度上，按照研究对象的分类标准，可以将其具体划分为以下几个类别。在第一类叙事研究类别中，最为关键的代表人物是普洛普，他是俄国形式主义的秉持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他创作了一部巨作——《民间故事形态学》，这也是当时叙事学领域内的巅峰之作与权威之作，是经典叙事学的代表著作之一。在此时的叙事研究领域内，研究人员更多的关注被叙述的故事结构，更加关注于探索、研究、分析事件本身所具有的特征、功能、状态、结构体系以及发展规律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专家学者们。在第二类叙事研究类别中，最为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热奈特，此时的叙事研究与第一类叙事研究类别具有很大的不同，它已经放弃了对故事结构的分析、探索与发现，已经开始从时间维度、语式层面、语态维度等出发，以多元化、多样化的语法范畴为切入点，对各式各样的叙事作品开展深入化、全面化、多元化的分析活动，以系统化、集中化、综合化的方式，对叙述故事的方式、方法等，也就是所谓的叙述话语，开展全方位、多领域、多层面的研究分析活动。在第三类叙事研究类别中，最为关键的代表人物有两个，一个是普林斯，另一个是查特曼，在他们看来，不管是故事结构，还是其中的话语技巧，都具有一定的关键性与重要性，研究人员应该在实践探索环节中平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重视这两个方面的发展。

1980年以后，以往的经典叙事学就在很大程度上遭受了大量的抨击，不管是后结构主义的相关研究人员，还是政治文化批评领域的专家学者，都对此提出了大量的质疑，也正是因为如此，后经典叙事学逐步被诞生出来，它的重要特征主要囊括了以下几点：第一，秉持后经典叙事学研究思想与研究精神的专家学者往往在作品剖析、作品解读、作品探索等方面，更加重视读者群体的能动性与发展性，更加重视社会历史语境的参与作用，更加重视意识形态等方面对作品本身的影响，更加关注作品自身的丰富性、延展性、开拓性，也正是因为如此，才逐步诞生出了后经典叙事学的三个流派，首先是以认知为主要内容的认知叙事学，其次是以修辞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修辞叙事学，最后是关注女

性需求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后经典叙事学的全面发展与不断普及。第二，后经典叙事学的专家学者更加重视文学之外的叙事内容，例如，社会领域内的新闻，民生范围内的法律条款等，更加重视文本之外的叙事内容，例如，艺术领域内的电影、绘画等，研究人员秉持大胆创新的精神，从其他学科领域汲取营养，充分挖掘其他学科的内涵、意义、理论基础、实践策略以及分析手段等，不断延伸了叙事学的发展层面以及研究范围，逐步探索构成了泛叙事观（Cpan-narrativity），叙事学也从最开始的单数形态，也就是Narratology，逐步转变为当前的复数形态，也就是Narratologies，不管是涵盖范围，还是涉及内容，都呈现出丰富化、多样化、多元化的发展形态。在社会实践发展中，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著名研究人员——蒙娜·贝克在深入探索过程中，汲取多方的努力与支持，撰写了著名的翻译巨作——《翻译与冲突：叙事学阐述》（Translation and Conflict A Narrative Account）。研究人员在著作中一方面将多种学科有机地融合、渗透到一起（第一个是叙事学，第二个是翻译学，第三个是政治学，第四个是传播学），以此作为基础，深入剖析了翻译实践活动作为叙事形式的一种，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经济建设、文化传播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与关键价值，还提出了对各式各样叙事的重视与关注，尤其提到了对非文学类型的新闻叙事内容的关注与重视，在这里，研究人员所展现出来的对社会语境、文化形态、文化内涵的重视，对泛叙事思想的侧重与关注，从内涵实质上来看已经可以划归到“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范围内了。

当前，不管是在国际发展领域内，还是在国内发展领域内，叙事学的研究内容都逐步丰富化、多样化、多元化，它被大量地运用到文学批评领域内，尤其是在针对小说类型的批评分析活动中被大量实践与推广，从整体上来看，叙事学与翻译的相互融合、相互发展、相互渗透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是全新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实践契机。在本书的探索研究中，借助于“泛叙事观”，基于对各类事件的研究与探索，提出了以下观点——叙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与我们紧密相连、相互契合的日常故事。正是因为如此，在对外宣传的实践活动中，我们可以借助于全球领域内人们都比较能够接受，比较容易接受，比较喜爱的方式与语言，诉说属于我们国家的文化故事，从这个角度来看，外宣翻译就是叙事方式的一种，就是以丰富化、多样化、层次化的方式，跨越国家之间的界限，跨越语言之间的疏离，跨越文化之间的差异，从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再叙事过程。

依据这些理论基础内容，本书基于科学化、合理化、细致化的原则，全面分析了“经典叙事学”以及“后经典叙事学”方面的重要特征与发展优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立足于叙事学维度，围绕广义层面上、宏观体系中的外宣翻译实践过程（第一个是外宣翻译之前的叙事选材活动，第二个是外宣翻译之中的叙事建构活动，第三个是外宣翻译之后的叙事接受活动），开展综合化、系统化、整体化的叙事解读。在外宣翻译之前的叙事选材实践环节中，外宣翻译工作人员应该立足于我国文化的发展内涵，基于我国对外宣传工作的叙事结构、叙事框架，充分考量、评估叙事赞助人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追求，合理剖析叙事内容受众群体的多元化需求，切实把握对外宣传实践活动的发展规律，以此切实促进相关实践工作的合理部署与高质量发展。在外宣翻译之中的翻译建构实践环节中，外宣翻译工作人员应该基于一定的微观视角，从文本发展层面入手（第一个是叙事时间，第二个是叙事视角，第三个是叙事结构），依托宏观层面、整体维度上的意识形态领域（第一个是时空建构实践活动，第二个是对多元化、丰富化、合理化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第三个是有效化、常规化的标示式建构实践活动，第四个是参与人的再定位实践活动），开展系统化、有效化、科学化的建构活动，这样做的目的是基于一定的文本层面架设桥梁，开展合理化、多元化、层次化的叙事交流活动，在文化内涵、思想追求、意识形态、思维观念等方面设置一定的藩篱，以此为基础，实施合理化、全面化的叙事竞争活动，这样的实践建构发展过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种具有多元特征、科学本质、合理特性的再叙事过程，也是一种超越国家界限，跨越语言分歧，超越文化属性的再叙事协调发展过程。在外宣翻译之后的叙事接受实践环节中，外宣翻译工作人员需要基于叙事内容受众群体、叙事内容接受群体的整体差异性，立足于外宣翻译实践活动的双重特征以及双重特性，借助于“归化——异化”二元发展、二元共存的外宣翻译实践技巧、实践措施等，基于合理化、适度化、有效化的发展原则，运用一定的“中国英语”翻译形式，依托叙事内容受众群体、叙事内容接受群体的个性化需求，借助于多元化的外宣翻译方式（第一个是删减，第二个是增添，第三个是重构等），以此全面增强外宣翻译实践活动中叙事内容受众群体的主观体验度与满意度，强化叙事接受的实践效果。笔者希望借助于叙事学研究视角，针对外宣翻译实践活动的相关理论与内容，开展细致化、全面化、有效化的分析，以此推动我国文化走出去，引导国际社会更加深入、正确、充分地了解我们，塑造更加积极、优质、正面的国家形象，为我国的快速发展奠定扎实的基础，创设更加优质的国际环境。

三、研究问题

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中，我们一方面要不断汲取国外研究人员的丰富经验与

文化研究成果，从中挖掘可利用、可借鉴、可吸收的内容，另一方面，我们要高度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与实践发展，持续提升我国优秀文化的发展活力与发展潜力，切实增强我国文化与全球文化不断提升、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在整体发展的实践活动中，外宣翻译实践活动作为有效化、合理化、科学化的跨文化传播活动，作为跨越国家界限，超越语言形式，跨越文化内涵的实践传播活动，一方面直接影响文化传播的实践效果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还可以切实评估国家层面上的文化传播水平与综合能力。但是，当前，在我国的外宣翻译实践活动中，不管是实践发展维度，还是理论探索维度，都处于发展的状态，综合实力与发展状况都需要更进一步的完善与优化。在本书的研究中，叙事学在实践发展层面上一方面具有微观领域内的文本分析作用，可以全面推动文本分析活动的顺利开展，另一方面，具有宏观领域内的意识形态剖析作用，可以实现对意识形态的细致化、深入化的分析研究，在微观层面与宏观层面上全面推动外宣翻译实践活动的有效发展，促进外宣翻译实践活动的创新变革，确保外宣翻译实践活动在实践发展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功能性与价值性，切实完善外宣翻译实践活动的传播力量，并从理论发展维度上切实丰富、开拓外宣翻译实践活动的研究维度与研究视角，促进外宣翻译实践活动的深入化发展，以此全面加强外宣翻译实践活动的理论深度。在本书中，主要探讨以下问题：

1．叙事学理论对外宣翻译研究的可行性及意义；

2．叙事学视域下外宣翻译的本质；

3．叙事学视域下外宣翻译的翻译策略及方法；

4．叙事学视域下如何提高外宣翻译接受效果。

四、研究意义

首先，叙事学以研究文学叙事，特别是小说叙事为主，本书将叙事学应用于文学之外的外宣翻译领域，既拓展了叙事学的研究范畴，也开阔了外宣翻译研究的视野；

其次，在批判继承叙事学的基础上，本书从译前的叙事选材、译中的叙事建构（再叙事）、译后的叙事接受三个方面对外宣翻译进行了全面的叙事学阐释，尤其是揭示出狭义的外宣翻译过程本质上是译者针对中外叙事差异从微观的文本层面和宏观的意识形态层面进行的一种再叙事协调，其目的是在文本层面架设桥梁，进行叙事交流，在意识形态层面设置藩篱，进行叙事竞争；

此外，通过叙事学与外宣翻译的跨学科联姻，本书将形成兼顾微观和宏

观、理论与实践，符合外宣翻译特点的系统性、深层次、跨学科的“译出翻译”研究成果。这不仅能揭示叙事学视域下的外宣翻译本质，拓展外宣翻译研究视野，进而丰富整体的翻译研究，也能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服务于我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

五、研究方法

本书运用叙事学的相关理论对外宣翻译进行分析和论证，论证中主要使用了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案例分析法和跨学科研究法，努力做到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定性和定量相结合。通过高校丰富的藏书和网络学术资源，对目前我国外宣翻研究的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和探究，揭示出我国外宣翻译研究的现状、问题及出路。目的是在文本层面架设桥梁，进行叙事交流，在意识形态层面设置藩篱，进行叙事竞争。通过叙事学理论以及语言学、翻译学、传播学等学科中的相关知识来对外宣翻译进行全面、系统的跨学科研究。

第二章　基本概念阐述

一、宣传

在“宣传”实践活动的发展历程中，不同研究人员针对“宣传”的理解层面、理解深度、理解立足点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东方与西方文化也对“宣传”具有完全不同的解读。在当前的宣传实践活动中，“宣传”的内涵主要来自西方国家，源自西方文化体系。在西方文化中，宣传的英文单词是“propaganda”，它最开始出现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的信仰宣传圣教会。由于“宣传”单词起源于圣教会，所以在最开始的词汇内涵中具有显著的宗教含义。后续在传播的过程中，“宣传”的词汇含义不断发展，逐步蔓延到政治发展领域。在英文体系中，直到十八世纪一十年代末期，“宣传”才第一次在英文中被广泛地运用与提及，并逐渐展现出显著的、明确的、丰富的政治色彩。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宣传”概念变迁的分水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纷纷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战时宣传，美国专门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统筹战时国内外宣传，这给公众造成一种宣传好坏枚关战争成败的印象；而此后揭批出来的战时宣传中歪曲事实、丧失新闻道德的一面，使得人们对于宣传产生了恐惧与厌恶心理。从此，英语中的“宣传”一词便带上了贬抑性的色彩，但“宣传”一词在一战之后获得广泛使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及法西斯宣传部长戈培尔对宣传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让“宣传”在二战之后变得更臭名昭著。时至今日，“宣传”一词，除少数情况下仍可表示“广告宣传”之意外，它已经沦落为“鼓动、愚弄大众与政治传声”的代名词。

这种理解和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立场基本一致，如美国传播学“四大先驱”之一的政治学家拉斯威尔在其博士论文《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术》中将“宣传”定义为：用有意义的符号，说得更具体但不那么确切一点，就是以描述、谣言、报道、图片和其他社会传播形式来控制舆论。而后，他从传播学出发对该定义进行了修订：“宣传”也是一种“传播”，是一种处心积虑地操纵传播，目的在于影响纷争，使纷争的结果有利于宣传者所偏爱的一方，这样“宣

传”就有别于一般的有意识的信息散布或形式上的单纯表达行为。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1985年中文版中，“宣传”的定义为：

“一种借助于符号（文字、标语、纪念碑、音乐、服饰、徽章、发式、邮票及银币图像等）以求左右他人的信仰态度或行动的有系统的活动，宣传均有明确的目的。为了达到目的，宣传者都以自己认为最有效的方式列举事实、陈述道理、施加影响。

上述三个定义都从不同角度对“宣传”的定义进行了界定，但第三个定义较为全面，不仅说明了宣传的性质、内容、方式、目的，还突出了宣传的政治性。由此可见在汉语中，“宣传”一词其实并无贬义，主要指运用传播观念去影响受众的思想和行动，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目的。

从上面“propaganda”和“宣传”各自定义可以看出，两者的本义或者说概念意义（conceptive meaning）或主题意义（thematic meaning）基本一致，都是指使用传播手段去传递信息，以达到影响受众思想和行为的目的，但两者的文化含义（cultural meaning）存在很大差异，中国文化中的“宣传”具有正面、积极的意义，而西方文化中“propaganda”具有强烈的贬义，几乎是虚假、欺骗的代名词（沈苏儒，2015）。正因为此，西方国家在开展宣传时对此词已是避之唯恐不及，很少使用“propaganda”一词，而用publicity，communication，information，promotion，public relations，public diplomacy等词替代。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共中央宣传部”从1997年开始弃用原来的“Propaganda Depart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改用“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而中共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一直采用“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的英文译名。本书所论述的“对外宣传”，主要采用我国“宣传”主要含义，事实上我们所提的“宣传”，其含义更接近于“传播”一词。

二、对外宣传

艾森豪威尔曾经说过：“在宣传上使用一美元，等于在国防上使用五美元”，正是因为对外宣传的重要性，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对外宣传的作用。从1940年延安成立国际宣传委员会算起，我国的对外宣传至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那么什么是“对外宣传”？为了理解这个概念，我们要结合“对内宣传”“对外传播”等相关概念来分析解读。

首先，“对外宣传”一般简称“外宣”，是与“对内宣传”（简称“内宣”）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也是一个中国本土化的术语。“对内宣传”是指我

国各级政府部门与各行各业对部门内部与行业内部所作的信息共享、精神传达与指导教育等工作。相对于“对内宣传”，“对外宣传”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对外宣传”指“中国的各级党委政府和企事业单位根据工作需要，针对本行政区划以外地区或本系统以外的受众所开展的信息传播、交流活动、或思想信仰的阐释、说服工作”。

狭义的“对外宣传”指中国各级政府部门与各行各业对境外、国外的宣传，是对中国大陆以外的对象所开展的信息传播交流活动或思想阐释说服工作。本书的“对外宣传”主要是指狭义的对外宣传活动。“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存在着共性，也有各自的特征。

从共性来看，“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都遵循一些宏观的基本原则。首先，“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都要“讲政治”。“讲政治”就是要将党的利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放在优先地位，并在实践中与宣传艺术有机结合起来，做到对党负责、对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也要对受众负责。其次，“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都要遵循传播规律。无论“对内宣传”，还是“对外宣传”，都要根据传播学先驱之一、美国学者拉斯韦尔1948年所总结的传播五要素，即传播者、信息、媒介、受众和效果进行宣传活动，注重传播的效果不论是对国内民众，还是对国外受众，“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都要做到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与时俱进，体现出新闻传播的真实性、客观性和时效性。“对内宣传”和“对外宣传”虽有差异，却彼此联系。

由此可见，“对外宣传”与“对外传播”也是联系紧密。有学者分析指出，在学术层面，“传播”可以涵盖“宣传”，对“传播”的研究有助于“宣传”的研究，而对“宣传”的研究则成为“传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沈苏儒，2015）。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外宣传”是“对外传播”的一种，是一种“以我为主”的带有说服目的的“对外传播”。

三、外宣翻译

了解了“对外宣传”，下面让我们来了解什么是“对外宣传翻译”即“外宣翻译”。2015年，黄友义先生首先采用传播学视角从“外宣翻译”形式上探讨了“外宣翻译”的定义。他认为，在国家的对外宣传中，翻译者的任务就是出色地将中文译成外文，通过图书、期刊、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以及各种国际会议发表和传播中国的观点。曾利沙教授则从外宣内容上，对“外宣翻译”进行定义，他指出，“外宣翻译”主要是指用英语对外介绍中国，包括政治经济、国防科技、文化教育等发展状况的对外介绍、各级政府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